

俄罗斯经典文学赏析

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对时间与生命的思辨

□杨书睿



季娜伊达·吉皮乌斯肖像
(1869—1945)



《月亮与迷雾》，【俄】吉皮乌斯著，汪剑钊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在以诗性风格和悲剧色彩闻名的俄国文学经典之中，季娜伊达·吉皮乌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与同时代的诗人勃留索夫赞誉她“仿佛是以浓缩的、有力的语言，借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画出了一颗现代心灵的全部体验”。她与生俱来的忧郁冷漠、对生命的感性体悟、对最终信仰求索而不得的苦闷，以及裹挟于社会变革之中的激情、战栗和挣扎，都熔铸进其毕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象征主义的诗歌创作之中。那些满溢着诗人自在的灵魂精神与摇曳的个人情感的诗性文字，同时凝聚着她对瞬间与永恒、死亡与永生的时间与生命辩证关系的深沉思索，最终构成“白银时代”里一道独具一格的文学景观。

1869年，吉皮乌斯出生于俄罗斯图拉省的一个德侨贵族家庭。自童年起，她就随父母处于漂泊不定的迁居之中。始终陪伴着她的，只有被她称之为“唯一主要的老师”的文学书籍和写作。1881年，吉皮乌斯的父亲死于结核病。这对年幼的诗人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不久之后，她自己 also 患上了同样的病症，这令其饱受死

亡的威胁。成年之后，吉皮乌斯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称自那时起，“就被死亡与爱情烙下了创痕”。这或许正是她在诗歌中反复吟咏人类、爱情与死亡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名基督教徒，吉皮乌斯总是通过描述时间的话语来展现宗教的上层结构，即以宗教观念中“瞬间的此世”和“永恒的彼世”作为诗歌创作的哲学底色，时间就此与生命相连。如《祈祷》中所写：月亮的影子静止不动/银色与黑色的天空/影子有如死亡静止不动/是否还活着，柔顺的心/请赐给我以往的沉默/啊，把我交还给你永恒/且让我深深陷入沉默/且让我安息在无限之中。银色的月亮与黑色的天空格格不入。在寒冷、孤独的氛围之中，抒情主人公实际是死亡之后的灵魂，她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发出了自己的祈祷，时间在这里成为烘托氛围的助力。结尾处的“永恒”与开头的“黑夜”相对应，因为黑夜意味着死亡，而死亡意味着彼世。唯其如此，灵魂才能在时间的永恒之中得以安息，这正是笃信宗教的吉皮乌斯所向往的。

无独有偶，在《暂时》一诗中，吉皮乌斯再次强烈地表达对死亡就是永恒的肯定：我憎恨人世间的“暂时”/一切都有尽头，无论痛苦与欢

乐/须知，无论河流如何源远流长/它总会有尽头，流到海洋中汇合/我同时反对大地与苍天/既反对鸢行美德，也反对灭绝人性/我只接受你一个，死亡/唯有你身上没有“暂时”只有永恒。

值得注意的是，吉皮乌斯是渴求灵魂自由的。从两首诗中可以看出，抒情主人公虽然渴求上帝救赎带来的永恒，却又在对自由的追求和对信仰的虔诚之间挣扎。她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立精神，但无法融合自己的精神与信仰是她苦闷的根源。主人公的做法在侧面反映出吉皮乌斯的某种困境。在吉皮乌斯身上，信仰是与生命交织的，实现生命的永恒需要忠笃宗教信仰的力量。但她又意识到“绝对宗教精神于我并非全部”，不愿放弃作为独立个体的意志与思考，于是只能选择沉默，尝试在沉默中抵达永恒。

毫无疑问，吉皮乌斯对时间与生命之关系的思索受到了宗教世界观的影响，但她同时从人的意志等维度进行反诘，从而使诗歌“流动着敏锐、生动和有机的思想脉搏，并与复杂的情绪变化相互交织，探寻着精神的完整，理想的和谐的主题”。

其一是对永恒价值的重新思考。在《时钟停摆》中，吉皮乌斯一反常态地将生命的不朽称作僵硬的尸体：我们因为短暂、因为轻松而珍藏的一切/突然变得不朽，变得永恒——和奇异/仿佛死者的尸体，逐渐冷却、僵硬/追求却没有意象，结束却没有终点/无形的永恒之秩序与和谐丧失了声音。比起一味追求永恒，此时的诗人表现出反对甚至抵抗的态度。时钟的停摆寓意着生命的终止，在宗教教义里，这是获得永恒的开端。但诗人认为，永恒虽然意味着不朽，但如同尸体般冰冷、僵硬。死亡固然能得到永恒，但这种永恒却是没有感情与温度的，它的价值与意义也就需要被重新估量。

其二是对瞬间价值的肯定。在《瞬间》一诗中，诗人将时间空间化：透过窗子，高空在闪烁/黄昏的天穹明亮又安谧/寂寞的心儿因为幸福而歌唱/它惬意于天空如此美丽/宁静的夜晚，灯光通明/灯光里释放出我的欢乐/此刻世界上再没有旁人/唯有上帝，天空和我。诗歌中上帝、天空和自我的并列，这正是《瞬间》的哲理底色。抒情主人公认为自我通过感知上帝可以获得永恒。很明显，这是吉皮乌斯在象征主义观念引领下对宗教世界观的重塑。此刻的时间是静止的，是瞬时的。诗人尝试将宗教与人同构，

完成个人生命与宗教信仰的和解，进而获取实现永恒的可能。但她忽视了时间的静止是相对于流动而言的，没有流动就没有静止，没有瞬间也就没有永恒。于是，吉皮乌斯进一步指出时间具有瞬间与永恒双重性的特质，并揭示其背后所隐藏的生命之间的联系。

时间逝者如斯，但现实的语言却是永恒的。在变与不变之间，吉皮乌斯发现了时间的缝隙。“在那种生存于其间死于其间的瞬间的后面追随着一个瞬间，生存也诞生于这后一个瞬间，正是这种前仆后继的瞬间状态，造成了时间永恒运动的形象”。诗人虽然追求永恒，但也发现了瞬间的重要性——短暂的瞬间与漫长的永恒并非矛盾，只是时间的表现形式，它们在不断地转换、挪移、交错，从而孕育出新的瞬间与永恒。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吉皮乌斯对永恒与瞬间的辩证思考的结果。“人生不满百，譬如朝露晞”，脆弱的生命与转瞬即逝的时间如此相近，但坚韧的生命又能在时间长河中沉淀下神学、哲学与诗学的丰沛内蕴。瞬间是个体生命相对于延绵不息的永恒而言的，于是瞬间不因其短暂而噤声，永恒也不因其无穷而不朽。诗人透过这一主题所要传达的，或许正是如何理解生命与时间的相似，即延续的永恒和存在的瞬间并行的生命意义。

作为一位敏感而富有才思的女性诗人，吉皮乌斯的诗歌还表现出“以鲜明的创作特色和精巧的创作手法表现出时代典型的心理综合征——自私的个体之人‘离群索居的诱惑’和个体在寻求信仰的路途上克服这种诱惑的努力”。这种风格无疑受到了她的丈夫、俄国颇负盛名的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影响。

1888年，吉皮乌斯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相识。一年后，两人走入婚姻的殿堂。尽管他们在文学方面经常发生争论，甚至是争吵，但吉皮乌斯从不否认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她的影响，甚至承认在“自觉地迎合这种影响”。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爆发的多次社会运动和战争，吉皮乌斯夫妇始终相伴在一起，即便是在离开圣彼得堡，流亡法国巴黎期间也不曾分离，一直到1941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去世。在充斥着紧张情绪与两次世界大战酿成的生离死别的氛围中，“爱与死的挣扎、生与死的交织、向死而生的探索”进一步丰满了吉皮乌斯诗歌中幽僻而深邃的精神内质和美学风格。

破局之光：斯诺与中国故事的全球传播

——重读《红星照耀中国》

□诸葛蔚东

2025年7月19日是埃德加·斯诺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作家，以报道中国革命闻名于世，其中，他于1936年采访陕甘宁边区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成为长篇纪实报道文学的名作。2020年4月，该书被列入教育部《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红星照耀中国》也被称为“史上独家报道”。斯诺当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成功实现了延安之行，打破了当时的新闻封锁，结束了延安“与世隔绝”的状态，为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打开了解延安的窗口，也开辟了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和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之路，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共抗战的真实状况，化解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困境。

1936年5月，也就是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意识到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中共当时迫切需要把这一信息传递出去。而斯诺也凭借新闻记者惊人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分析能力，认识到中共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意义，“红星”将照耀世界。

正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指出的，《红星照耀中国》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打开了认识中国的新窗口，这也是该书在美国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也为《红星照耀中国》所打动，并在白宫约见了斯诺。

斯诺站在中共的立场批驳日本的侵略行为，在国际社会呼吁切断对日本的资源和经济

支援，组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些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国际舆论，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近年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开放的历史档案刷新了以往对《红星照耀中国》的解读和认知。实际上，《红星照耀中国》不仅使日本的国际形象受到了冲击，促成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在日本国内也引发了进步人士反战意识的觉醒和对中国革命的同情。

1936年10月底，斯诺结束在苏区的采访，秘密返回北平后，便开始整理他在西北的采访报道，准备《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在书稿正式付印之前，他已开始在报刊上陆续发表采访报道，这引起了日本的情报部门的注意。1937年2月，日本有关刊物刊登了《斯诺西北苏区考察报告》等文章。

1937年3月24日，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河相达夫发给日本外务大臣佐藤尚武的题为《埃德加·斯诺发表考察西北“苏区”记》的电文中，就斯诺在上海《大美晚报》上发表的报道做了汇报，并附上了该报道的译文：“1936年4月上旬，伦敦《每日先驱论坛报》驻北平远东特派员埃德加·斯诺，对陕西甘肃等地进行了近四个月的考察，并采访了毛泽东，其后斯诺在北平协和教堂做了关于在红军苏区视察的讲演，讲演稿刊登在上海的《大美晚报》上，现将全文译出以供参考。”

这些内部情报和机密电文说明，对斯诺在苏区的采访报道，日方高度警觉。这里所说的讲演是指斯诺于1937年1月21日在北平做的报告，这是斯诺从陕北回来最重要的一次公开

讲演。在演讲中斯诺对红军的长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已成为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中国必将取得抗战的胜利。

日本内阁情报部收藏了大量抗战宣传文獻，其中斯诺在进步图书馆出版的《毛泽东印象记》也被收编在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对日宣传文档中，该书是斯诺采访毛泽东手记的中文译本，由此也可以看到日方对斯诺新闻实践活动的定位和认知。

日本媒体也在第一时间开始关注斯诺的西北之行。1937年6月，《改造》杂志刊发了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访谈：中国应选择的道路》，11月号又发表了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这些报道不久就被政府封杀，《中央公论》在1937年11—12月号连载了《红星照耀中国》的部分章节，但随即遭到查禁。尤其是《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国际舆论反应强烈，日本当局极力控制本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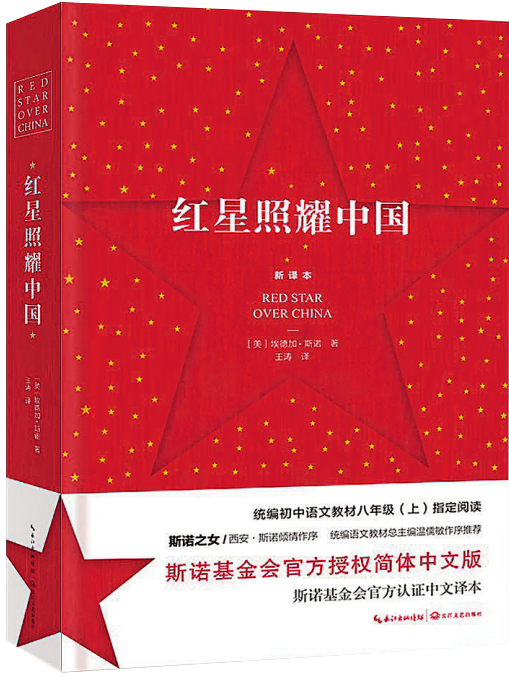
在战争期间，《红星照耀中国》犹如划破夜空的一道流星，让日本进步人士看到了时局发展的方向。史料表明，《红星照耀中国》全书虽然没有公开出版，但该书的英文版在战时日本民间开始流传，河上肇阅读了《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著后对中国的抗战有了深入的认识，他十分认同斯诺的观点，即中国一定能获得抗战的胜利。河上肇将自己的阅读体会分享给志同道合的学者，如著名经济学家堀江邑一、著名汉学家、时任京都大学文学系主任小岛祐马等。《红星照耀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对时局的判断和

认知。

在中日恢复建交前，该书成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的窗口。1952年7月，日本筑巢书房终于公开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书中对中国民众革命形象的生动描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后日本一度处于美军占领之下，与之相比，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形象和社会建设理念，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一场推进世界变革的运动，为了寻求社会变革之路，人们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路径。

在中日建交后，《红星照耀中国》进入了中国主题阅读图书的必读书目，成为日本读者认识和了解中国的基础教科书。1972年9月，中日建交的时机成熟，在两国的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日本兴起了“中国热”，《红星照耀中国》再度成为热点话题，图书销量大增，因应市场的需求，《红星照耀中国》以不同的译本、版本和开本的形式发行，引发了人们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热情。

《红星照耀中国》在国际社会讲传中国故事产生的影响和启示，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和认识。检索全球联机联合目录数据库（OCLC）可知，近一个世纪以来，《红星照耀中国》已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文字在全球出版传播，该书问世后一直在国际图书市场流通，版本语种和发行量持续增加，该书出版语种最初主要有英文、中文和日文，后来有法文、意大利文、德文、瑞典文、西班牙文等，与国际政治的变化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与交流的潮流相呼应，成为阐释和解读中国社会变革道路的范本。



《红星照耀中国》，【美】埃德加·斯诺著，王津涛，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8月

在纪实报道文学的经典作品中，《红星照耀中国》的位置是独特的。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在和平发展时期，该书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埃德加·斯诺留下的宝贵文学遗产。这部作品的影响持久深远，历久弥新，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斯诺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原因。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温埃德加·斯诺在国际社会讲传中国故事的影响和启示，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馆藏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史料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